

1979 ●

1980 ●

1981 ●

1982 ●

1983 ●

1984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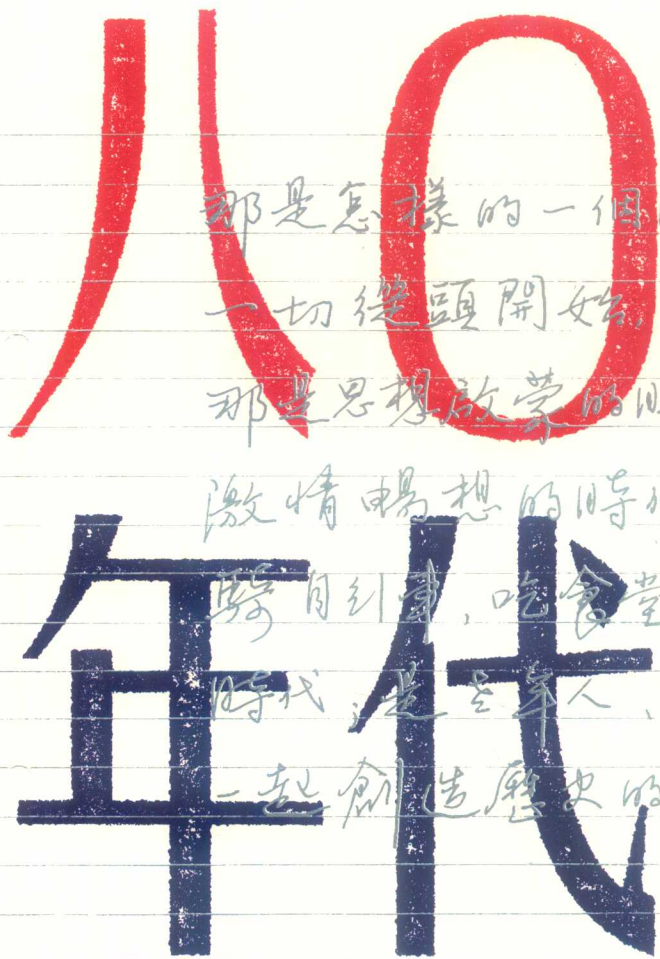
1985 ●

1986 ●

1987 ●

1988 ●

1989 ●



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？

一切從頭開始，英雄不問來路。

那是思想啟蒙的時代；是充滿

激情暢想的時代；是穿軍大衣，

騎自行車，吃食堂、住陋室的

時代；是志願人、中華人、青年

一起創造歷史的時代。

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

柳红 著

The 1980s and Chinese Economists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79 ●

1980 ●

1981 ●

1982 ●

1983 ●

1984 ●

1985 ●

1986 ●

1987 ●

1988 ●

1989 ●

八〇年代

中国经济学人的
光荣与梦想

柳红 著

The 1980s and
Chinese Economist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/ 柳红著.

-- 增订本. -- 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220-11178-5

I. ①八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中国经济史-现代

IV. ①F12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5213号

BALING NIANDAI: ZHONGGUO JINGJI
XUEREN DE GUANGRONG YU MENGXIANG

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

柳 红 著

责任编辑：唐 婧

特约编辑：曹凌志 黄 燕 王家胜

装帧设计：高伟哲

内文制作：李丹华

责任印制：祝 健

出版发行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成都槐树街2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scpph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33.5 字数：450千字
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978-7-220-11178-5

定价：7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？

一切從頭開始，英雄不問來路。

那是思想啟蒙的時代；是充滿

激情暢想的時代；是穿軍大衣，

騎自行車，吃食堂、住陋室的

時代；是志願人、中華人、青年

一起創造歷史的時代。

目 录

001 增订本序：1980年代的“民族记忆” / 朱嘉明

007 序 言 / 刘国光

009 序 言 / 高尚全

011 自 序

023 楔 子

027 第一代（1900—1920）

029 三本书的命运

三位开路先锋：孙冶方、薛暮桥和于光远。三幅人物肖像：一位犀利，一位沉稳，一位潇洒。他们风格互补，是一个组合、一个团队、一道风景。

051 两份《初步意见》的背后

这分明是一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。历史常常是这样，高瞻远瞩的思想，一时不被接受。不过，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，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。

057 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

莫干山会在思想上和所涉及问题的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，但是影响有限。它本可以开得更精彩，影响更大，但是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。

064 薛暮桥：把“漏洞”改成“大门”

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。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条件下，大利大干，小利小干，无利不干。

073 蒋一苇：挺进，挺进

“壮志未酬”这几个字，是肺腑之言，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，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，但艰难曲折，难以想象。

084 访日归来

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。遗憾的是，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，一次次中断，一次次重来。

095 承前启后的结构组

事关“结构”，此前都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，农、轻、重比例关系来分析阐述。提出经济结构，具有极大的创新性。

104 光荣绽放的工经所

马洪和蒋一苇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的带头人，鼎力相助，成就大事。他们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，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，形成智囊。

114 附录：马洪——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/ 朱嘉明

122 遥想“技术中心”当年

马洪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，超越条条块块，超越学科专业。把经济、技术、工程相结合，同时考虑制度因素，使前者不空洞，使后者不孤立。

137 1983—1984年，中国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大讨论

《第三次浪潮》所描述的人类进程和方向，令国人眼界大开，震撼、兴奋。有人敏锐地发现我们的机会——不必亦步亦趋，走西方现代化老路。这项研究演化成一场对国民的启蒙教育，空前绝后。

145 “孙冶方奖”的精神

孙冶方基金奖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。第一不尚空谈；第二强调突破；第三勇于坚持真理。

154 徐雪寒：丹心雪寒

他错过了建立计划经济的历史，一跃为市场取向改革奔走呼号。他的头脑里，大概从来没有插入计划经济，早年 and 晚年，两段市场经济对接起来顺理成章。

161 新老交替：经济中心的投票

当时的中心是精干的，没有官僚层次的，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面对部长，甚至国务院领导。老年人有开放的胸襟。因此，它们才有了了不起的工作量和影响力。

167 常识战胜愚昧：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

一场全国性大科普运动，几乎成了认识世界、了解中国、发展科技的思想大解放。历史关头，朝野做出了选择：追随世界潮流。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！

176 杜润生：好大一棵树

他总说“我们欠农民太多”。农民穷，中国穷，农民古代化，中国不可能现代化，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，谁就是数典忘祖！

- 191 第二代（1920—1940）
- 193 体改委：改革的“中枢”
它一成立就迅速生根，发展一张横向纵向的网。政令一出，即可到达每个节点。改革，从来不是口号，不是抽象的概念，是实施。
- 207 吸引外资：谁利用谁
“文革”时期，不要说向国外借钱，即使向国外买设备、都是卖国主义、爬行主义。因此，要借外债，引进外资，阻力非常大，每走一步都是较量和博弈。
- 217 探索与选择：对南斯拉夫、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
在一开始不能效法英、美的情况下，在同宗同种、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，向南斯拉夫“取经”是最佳选择。
- 228 刘国光：从标兵文章到双重模式
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、劳动人民立场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立场，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。
- 238 完美的互动：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
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，他们竟这样汇合了。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。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、亲切的、有效率的、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。
- 247 颐和园讲习班
这个有“黄埔一期”称号的“颐和园讲习班”，永远和激情、开创、突破联系在一起，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。
- 257 开讲西方经济学
如果不是在改革初起，那样大张旗鼓地讲西方经济学，中国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；改革开放，也全然没有思维的基础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符号。
- 269 东欧来风：布鲁斯
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。归根结底，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，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。
- 277 东欧来风：奥塔·锡克
这是中国阳光灿烂的思想解放时期。波兰拒绝布鲁斯，捷克拒绝奥塔·锡克，中国向他们敞开了大门，表现出求贤若渴，力图改革的历史勇气。
- 286 东欧来风：科尔奈
在一个社会里，出产什么样的杰出人物，或者这些人物得以杰出，需要特殊的土壤，他

们遥相呼应，在意识、理念、勇气和智慧的发掘程度上互相影响。

29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：道口有道

必须与两个轨道相接：一个是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轨，一个是中国改造既有体制的轨；要以非常思路，非常速度，办非常学校。

306 辉煌，但是不可持续——解读“五道口”现象

三十年五道口，有骄傲，也有遗憾；有满足，也有自省；有荣耀，也有教训。“五道口”是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里程碑，上面记载着一个独特的、绝无仅有的五道口现象。

315 西天取经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早的访问学者

黄范章、乌加培、赵人伟、吴敬琏是19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负笈英美的四位。历史选择了他们，他们也抓住了历史的机会。

337 1985：巴山轮之行

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，改革的道路问题就显现出来了：是激进的“一揽子”，还是渐进？

344 《经济研究》：沉重的转型

我编《经济研究》没别的企求，只是想把自己当成一块砖，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。

356 董辅初：守身为大

“保身”是不同流合污，不够！保身的人，可能丢弃原则，背弃真理，抛弃节操；守身是坚守节操。

364 一颗留下轨迹的流星：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
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人文主义勃兴，青少所就是呼唤人性的一个产儿。如果1984年这个研究所没有被裁撤，是不是有可能对青年人和在校生的思想及选择产生影响，或者向当时的决策者提供更及时、真实的青年人信息及政策建议？

376 对话1987

争取群众的理解，需要把经济学家在沙龙里议论的主题变成群众的语言；需要把改革的底交给群众，同舟共济，共同承担改革的欢乐和风险。

391 改革思路的碰撞

经济学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，创新和争鸣是不可分的。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，集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399	第三代（1940—1960）
401	脚踏实地的发展组
	把基层的实践和创造与高层决策、“红头文件”联系在一起。人人是笔杆子，个个杰出，它更像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，展开着一场崭新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。
418	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：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
	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，常常是不约而同，来自很多人。必须注意“头脑风暴”的作用，相互刺激，互相启发。这是莫干山会的贡献。
433	历史之棱镜——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
	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，是钱塘涌潮之最，排山倒海，声浪震天。刚刚下山的青年，聚精会神于潮涨之壮丽，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眺望潮水涌来退去，对改革前景充满乐观憧憬。他们无法预见，往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那么惊心动魄。
452	天津会议：腾飞的构想
	我们的愿望是要超过莫干山会议。借着改革的东风，充分利用当前改革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舞台，承担起时代赋予中青年的历史使命。
460	《论坛》春秋
	在发表文章的青年中，很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文，他们的学术生涯由此受到激励，由此起步。放眼今日中国之风云人物，很多都与《论坛》曾经结缘。
472	西部畅想曲
	西部，是中国人的西部。大家的目标、激情、感情融合起来了。当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时，更增添了悲壮感，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砸实。
487	组合的力量
	1984，1986，1988，循着这个轨迹看去，华生团队最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开拓。所有的知识都是拿来用的，决不固守。
497	参考文献
501	人名索引
513	后 记
523	增订本后记

增订本序

1980年代的“民族记忆”



朱嘉明，经济学家，生于1950年，北京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，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，1984年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。

在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周年之际，柳红的《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再版，值得高兴。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。近年来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表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的怀念情感，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趋势。这其实是一种“民族性”历史记忆的表现。一般来说，“民族性”的历史记忆有这样几个特征：跨越社会的阶级和阶层；涉及至少三代人；不断被重新解读和赋予新的历史含义，构成民族文化的反思现象；记忆可以传承更年轻的一代人，引起后人的共鸣。中国自20世纪开始至今，120年过去，从清朝到民国，再到共和国，历史事变多矣，几乎每个十年都有它的特色，没有任何上一个十年可以预测下一个十年。但是，属于“民族性”的历史记忆并不太多，大概有三次：第一次是抗日战争；第二次是“文化革命”；第三次是1980年代改革。抗日战争和“文化革命”所留下的“民族性”的历史记忆符号是灾难、困苦以及悲欢离合、家破人亡；而1980年代给人们留下的符号是宽松、理想、希望和热气

腾腾的向上与进取。这是因为：1980年代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框架，奠定经济起飞的基础，确立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格局，整合了国家的精神和物质资源，开启全方位现代化转型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1980年代，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不可逾越的时期，更是中国未来历史的全方位坐标。今天中国的各种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问题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在1980年代中找到基因和逻辑。1980年代不仅吸引着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，同样吸引着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年轻人。

在1980年代“民族性”的历史记忆背后，其实有着1980年代特有的“精神结构”，或者“精神范式”，而“理想主义”和“浪漫主义”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子。

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历史中，绝大多数的岁月是平庸无奇的，能够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。被记载下来的年代，许多是精彩的和激动人心的，是与一种精神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，例如：基督教文明诞生，文艺复兴，法国大革命，美国独立战争，工业革命。在20世纪的中国，为什么五四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地位？说到底，是因为五四运动与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联系在一起，民主和科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精神和理想。相比较而言，与五四运动前后并行的实业救国运动，虽然有着非常正面的历史作用，却并不被人们崇尚，因为实业救国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和利益的运动。二战后的美国真正被历史高度肯定和记载的，其实就是1970年代的反战和学生运动，是马丁·路德·金的“我有一个梦想”，它们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轨迹。

中国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丰厚和多元：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，以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。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着自己的理想：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，穿好衣，孩子能上学；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，家里有上“三大件”；知青的理想，回城，读书，找到工作；在科学家那里，让科学的春天持续下去，就是理想。

总之，那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想，不论是深刻的，偏重精神和思

想的，还是朴实、简单、平常、偏重物质的，彼此相容，求同存异。人们持有一种共同接受的价值观，道德取向一致。从普通老百姓到政治精英，人人希望改革，每个人心里也都有自己对改革的理解和期待。最初改革的概念并不清晰，谁也无法定义改革，谁都不能说清楚什么叫改革，但是，每个人都赋予改革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含义，于是，改革既抽象又具体，既美好又艰辛，既那么遥远又似乎触手可及。正是这样，人们对于改革的期望和理想，如同溪流汇成江河，成就了历史性大潮。不然，1980年代也不会激荡起那么多人的激情。这是个真实的历史过程，这是少有的历史现象。

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还有浪漫主义。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的理想主义是共通的。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，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，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，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。1980年代改革，是对计划经济和当时体制的一次解构，解构过程导致社会呈现出增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，只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。于是，改革导致人们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解放，最核心的是人性的解放，激发出丰满的、色彩斑斓、万象纷呈的历史时期。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浪漫主义，与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，有些相似之处，基于对传统理念和理性的幻灭和批评，重新认知直觉和想象力，其中伴随着一种波及社会不同层面的精彩和活力：星星画展，朦胧诗，意识流，校园歌曲，沙龙，聚会，交谊舞，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，等等。连经过调整经济结构、增加轻工业品之后的商品消费，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，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，广告、烫发、时装、色彩、商业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。那时，经济学家也有他们的浪漫，为农民疾苦呼喊，为工人争取奖金，为企业扩权发声，为证明和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、活动、写作、建言。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，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。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的“莫干山会议”，体现了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。

在1980年代，每个人理解的改革都不一样。每个人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糅合在一起解释改革、期待改革。如今，1980年代的老人大都过世，那时四五十岁的人如今已经七八十岁，那时二三十岁的人已经五六十岁。但是，我们看到，1980年代已经被时间沉积为可以传承的文化，超越了“个体”性和“个人主义”的记忆，而成为一种民族和国民性的“历史记忆”。

人们怀念1980年代改革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那个年代存在过的，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，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永远有魅力，现在人们的失落是基于这样一个反差。但是，如果就此以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脱离现实的，那是不对的。改革的真实历史场景是严酷的，人们需要改变思想，承认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，还要承认，“文革”之后的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。改革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，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。所以，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，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，但是，仍然选择改革，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。

改革需要直面严酷事实，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。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，他们之所以按手印，签生死状，决定包产到户，其实既是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新的翻身，为了人的尊严，也是一种理想。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，起初，就是为了一个理念：让内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，不必冒着丧生于退潮的海滩上的危险逃到港澳去讨生活。所以，现实和理想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，只是后人在提及民族记忆的时候，会把理想主义背后的现实淡化。要知道，在历史的某种状态下，对多少年轻人来讲，能够吃饱穿暖，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，能够摆脱说话的恐惧，那就是理想。

当然，后来总结1980年代，还是需要反省的。1980年代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，它们的共通之处包括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。高估，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；低估，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。

十年前，柳红开始写“八〇年代”的人与事，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，第一次向读者呈现1980年代宏大的改革场面。她的视角，不同于海外汉学研究较多关注的中国政治精英，更不是着眼于中国媒体上的“明星式”经济学家，而是写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。在这个群体中，有老年的、中年的、青年的，涉及数百人之多，通过他们参与的一件一事项，呈现时代的演变。在那个年代，是民众的现实主义唤起了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精英的理想主义，精英的理想主义再赋予大众的现实主义以更高层次的意义。

如果说，改革十年时，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改革和发展空间的想象和奋发有为，改革二十年时，人们开始投入商海，追逐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快感，那么，在改革三十年时，一方面是奥运会推动的“崛起”高潮，一方面是贫富差别的扩大，在改革四十年时，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，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此时此刻，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，或逝去，或老去，或离开了舞台，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。经济学“显学”时代悄然结束。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面对历史与现实的“沉思”，怎样继往开来，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，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？

研究1980年代，是个历史工程，需要分门别类。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，集中在经济学界，从人与事入手，搜集史料，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，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，为逝者，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、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，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，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。她视这样的公共写作为一种社会责任，但她的研究也为建立1980年代研究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些史实基础和研究线索。并且她本人近年来也已转向将1980年代历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加以系统地理论研究。1980年代研究，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，甚至说形成“1980年代学”都不为过。自2010年柳红的《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出版，八年过去。这本

书为中国 1980 年代的研究者所关注，为普通读者所接受，正是它再版的价值，期待柳红在 1980 年代研究方面的新成果。

2018年3月30日

序言

刘国光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及其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。生于1923年，江苏人，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。1982—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柳红请我为她的书写序。为人写书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斟酌再三，不是要不要写，而是如何写。

这本书里的文章，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，它们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。很多事件是我亲身参与、经历的，也有我忘记的事情；很多人物都是我熟悉的，有师友，有同事，有学生，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。柳红告诉我，我是她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人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就是历史。

《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讲的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和贡献，特别是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经济学家。在前年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，出版过很多纪念文集和相关的书，总有上百种。与那些书相比较，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：其一，聚焦在80年代，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谈80年代。通过写老一代经济学家，让人们看到了80年代以至更久远的历史的延续。老一代，不论参加革命时间早晚，受教育程度高低，都经历过1949年中华人民